

按语:敦煌学一度号称“显学”,即“地位显赫的学问”。然时至今日,其地位仍未有实质性改变。概因懂得此门学问的人屈指可数,其中某些领域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例如敦煌语言文字研究,本该是个热门,但是目前国内外的专门研究者也就十数人,卓有建树者仅三五人而已。其中原因也许主客观纠葛复杂,但有一条显而易见:敦煌学不在教育部学科体系之列,属于立体交叉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现实特点,即敦煌学家总在各地星罗棋布,除了敦煌研究院聚集了一批艺术考古类专家,高校、社科院系统都未能将三位以上的敦煌学家有效编制到一个单位。鉴于此,多辟些敦煌学阵地,将散落的敦煌学家通过集中发表科研成果的方式联结起来,就尤为必要且具备重要现实意义了。

目前,敦煌学研究的学术科研阵地,主要有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研究》、兰州大学主办的《敦煌学辑刊》、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敦煌学研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台湾地区敦煌学会主办的《敦煌学》、北京大学主办的《唐研究》等。这些对于敦煌学的学术科研进展以致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缺陷也很明显:周期长,倾向性强,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排版困难的考证性论文未能够及时刊发,书法史、写本笔法特征分析等方面的论文也较难发表。百花齐放,独缺一枝。鉴于此,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厅党组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艺术百家》编委会决定开辟“敦煌学研究”栏目。《艺术百家》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黄征先生敢于担当,勇担责任,不仅为该栏目的创办鼓与呼,且不辞辛劳,热情组稿,四处奔走,同时把《艺术百家》、更把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学术精神以及海纳百川的文化气魄、“百家争鸣”的宽广胸襟推向了海外。栏目创设伊始,主要刊发与敦煌学相关之艺术、民俗、文化、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面的学术成果,以促成敦煌学研究以中国为中心、辐射全球共同繁荣之局面,从而进一步实现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敦煌学自 1908 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江浙学者罗振玉分别发表第一篇论文,至 2008 年底《艺术百家》创设“敦煌学研究”专栏,恰为 100 周年。时代意义,自不待言。当此之际,编辑部衷心感谢“江浙散人”黄征教授的大力支持、毫无推脱、热心主持,同时也与黄征教授一道恳请广大学人人为本栏目热诚撰稿,企盼支持,共同研讨,共襄盛举。

敦煌学翻天覆地三十年^{*}

黄 征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中国敦煌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敦煌学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在国际上地位高低的一个测量标杆。敦煌学在中国的低迷、落后,就意味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低迷、落后;敦煌学在中国的飞速发展以及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象征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国际上总体有了提高甚至飞跃。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创立期(1908-1931 年)、发展期(1932-1966 年)、停滞期(1967-1977 年)和繁荣期(1978-2008 年)。笔者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从事敦煌学研究,一路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尤其是敦煌学学术研究的迅猛发展。30 年中,从季羨林任会长创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到常书鸿、段文杰任院长创建敦煌研究院,再到姜亮夫、蒋礼鸿受命主办敦煌学讲习班,中国敦煌学在这 30 年的自身

^{*}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重点科研项目“江苏与敦煌学”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征,又名黄徵(1958-),男,汉,江苏淮安人,生于浙江江山,杭州大学文学博士,先后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古典文献学敦煌语言文字学)合作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敦煌学研究》主编,《艺术百家》学术委员会委员,《唐研究》编委,《东亚文化研究》编委,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首批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敦煌学,语言文字学,训诂学。



繁荣期中不仅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其国际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谓硕果累累,举世瞩目。笔者通过自身感受,对中国敦煌学研究 30 年来的发展状况作了回顾和点评,确实反映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对我国乃至世界敦煌学研究以至文化建设的重大作用和积极影响。

关键词:当代中国;敦煌学;发展;改革开放 30 年;繁荣时期;成就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 30 年,学术研究迎来了春天,诚可谓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过要说“翻天覆地”,最典型莫若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地位的突变。这里得先插叙一个掌故。1981 年,日本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应南开大学之邀,在南开大学举办了一个敦煌学讲习班,从全国各地来的不少学者和学生,包括现已卓有建树的朱雷教授等,都到南开来听讲。当时藤枝晃先生在讲演时说:“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①此言一出,激起愤慨,以至于后来简化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两句,藤枝晃先生因此而多年来被学术界、舆论界批评。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中国学术界经过“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学术研究确实荒芜一片,敦煌学研究更是“绝学”,^②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水平真的是在日本之下,藤枝晃先生后来虽然辩解自己只是转述,却仍然也还是代表他的正常评价的。只是应该说明的是,他当时是来传播敦煌学的,并无轻视中国之意,是中国学者自己感受到了某种不平。

由于敦煌文物文献的早年流失国外,所以中国敦煌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敦煌学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在国际上地位高低的一个测量标杆。敦煌学在中国的低迷、落后,就意味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低迷、落后,敦煌学在中国的飞速发展以及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象征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国际上总体有了提高甚至飞跃。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我本人从 1979 年考上大学本科,到 1985 年考上硕士生、1990 年再考上博士生并专业从事敦煌学研究,就一路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研究等方面的迅猛发展。30 年来,中国敦煌学有了长足发展,其国际地位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硕果累累,举世瞩目。

一、季羨林任会长创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在中国敦煌学的复兴之初,季羨林先生出面组织和申请,创建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并报告中央,经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批复,拨出专款进行敦煌学研究,这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因为在当时,这个学术团体具有政府组织的性质,不同于现在的“松散民间组织”,在凝聚全国敦煌学研究者力量方面担当了主要

角色。1983 年 8 月 15 日至 22 日,在兰州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以及“1983 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地区的汉、满、蒙、回、藏、维吾尔等六个民族的 194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 85 篇,并就历史、遗书、考古、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学科和专业分为 6 个小组,围绕有关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大会还讨论通过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章程,并聘请李一氓、周林、吴坚、姜亮夫等 27 位著名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担任该学会顾问;选举季羨林、段文杰、唐长儒、张锡厚、金维诺等 60 名同志组成学会理事会,推举季羨林先生为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后设址北京大学,下设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科技史、体育卫生、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染织服饰等专业委员会,并有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新疆吐鲁番学学会等团体会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术研究活动,为今天的中国敦煌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敦煌学乃至世界敦煌学,都在季羨林先生的大智慧引导下,三十年来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既切磋琢磨甚至激烈辩驳而又友好合作、团结互敬的学术氛围,使得敦煌学研究者一直都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季羨林先生的跨越西东、高瞻远瞩,他的许多精辟深邃的见解,至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例如在思想理论战线重要期刊《红旗》1986 年 3 期上的《敦煌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季羨林先生精辟地总结道:“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这对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来说,确实是再重要不过了,因为它不仅揭示了敦煌吐鲁番学的真谛,鼓舞了研究者的信心,指引了研究方向,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引起了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地方组织的重视并给以积极支持。

又例如,一直以来就有“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敦煌学回归中国”、“敦煌学回归故里”之类的话,虽然也有一定得内涵,但是不够开通,积极意义不足,以至于学术界往往会有些无谓的争议。在 1988 年北京召开的

“中国敦煌学研讨会”的大会讲话中,季羨林先生则首次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一下子消释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敦煌学名分上的一个难解疙瘩。季羨林先生还在《群言》1987年第11期发表《要尊重敦煌卷子,但且莫迷信》,在《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发表《对当前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点看法》,以及亲自撰写发表多篇重要学术论文,都对推动中国敦煌学的研究走向昌盛起来重要作用。

当然,我们说季羨林先生的特殊作用,也是在我国各领域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才能显示出来的。

二、常书鸿、段文杰任院长创建敦煌研究院

敦煌研究院是中国政府设立的负责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西榆林窟和敦煌西千佛洞的保护、管理和研究的综合性专门机构,其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段文杰先后任所长,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常书鸿任名誉院长,段文杰任院长。现任院长樊锦诗。下设保护研究所、美术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文献研究所、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数字中心、信息资料中心、《敦煌研究》编辑部等,还设有下属企业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并受国家文物局委托管理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该院现有正式职工266人、合同聘用人员250人,已发展成为国内外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遗址博物馆、敦煌学研究基地、壁画保护科研基地。

回顾过去,我们深深怀念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先生。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先生肩负保护世界艺术宝库的伟大使命,毅然离开在法国较为优裕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举家奔赴荒漠戈壁中的莫高窟,无私地把自己的学识、才华和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敦煌这座艺术的殿堂,在敦煌默默工作近40年。在他的感召和带领下,一批批矢志不渝的有识之士扎根敦煌,痴心致力于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事业,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敦煌研究院的建立,中国敦煌学研究才有了一支“正规军”,才把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艺术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优势一下子夺了回来。这一方面是老一辈敦煌学家的感召,一方面也是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等文物实体全部在敦煌研究院的掌管之下,得了天时地利之便。如今在敦煌壁画、彩塑等的研究和临摹、创作方面,虽然国外也有高手,但是总体上水平和人员数量都已无法与中国匹敌。

相比而言,常书鸿虽然是最享誉世界的敦煌艺术家,并且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敦煌的事业,但是却未能象段文杰那样轰轰烈烈做一番自己想做的敦煌学研究事业。这主要不是常书鸿先生个人有什么问

题,而是他时运不佳,一辈子只看守着莫高窟,却没有很多机会进行研究和拓展事业。等到改革开放开始了,大展宏图的机会到来了,他却年事已高,不得不退居二线,他所想要做的事业都由继任者段文杰来实施完成。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三十年可是实实在在的三十年,能够赶上这三十年可以谓之“预流”,错过机会的就属于“未预流”。——常书鸿赶上“敦煌学”草创时期,算是“预流”,没有赶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好时光,则又属于“未预流”。他的年富力强时期,都给了天天挨斗受批判。我手上有一批档案资料显示,就是他的“亲密战友”或者直白说是下属,把他关于敦煌艺术的各篇文章汇为一编,然后大字标上“批判资料”,在上面密密麻麻地批注着各种侮辱性的话语,大会小会拿出来劈头盖脸批一通。^③在那样环境中,试想还有谁能做敦煌学研究,还有谁敢做敦煌学研究?

三、姜亮夫、蒋礼鸿受命主办敦煌学讲习班

1984年,我的导师姜亮夫、蒋礼鸿先生受教育部之命,在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主办了一个敦煌学讲习班。不过我没有参加过这个讲习班,因为我要到1985年才考上硕士研究生跟姜亮夫先生学习。虽然未曾亲历,可是受导师影响,我后来就一直从事敦煌学研究至今。当时姜先生年事已高,一般不亲自授课,我听得最多的是郭在贻先生的课,郭先生也是著名敦煌学家。1990年,我又随蒋礼鸿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而蒋先生也是著名敦煌学家。这三位导师的学问和为人,始终影响着我,引领我在敦煌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上不断前进。因为三位先生不仅是敦煌学家,也都是语言学家。敦煌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必须与某个学科结合才能产生新颖深邃的新学问。

姜亮夫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是王国维的研究生入室弟子,民国时期曾自费前往英法等国学习和考察。当他看见许多中国文物,特别是敦煌写本,都陈列在博物馆、图书馆中,可以免费阅读,就亲手抄录,以及用节衣缩食的方式省下来的钱翻拍照片,然后博士学位也不要攻读了,就直接带着珍贵资料回国进行研究,后来完成了二十四卷本《瀛涯敦煌韵辑》并出版发行。姜先生特立独行的爱国主义举动,深深感动了许多中国学子,早在中国的学术界确立了很高的地位。因此,1984年,教育部委托姜先生负责主办一个“敦煌学讲习班”,目的是培养一支有素养的敦煌学研究队伍。这期讲习班由姜亮夫先生主讲。姜先生此前曾经出版过《敦煌——中国文化的宝库》一书,对于普及敦煌学知识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那个时候内容相似的书很少,所以姜先生的这本书几乎就是中国学子敦煌学入门唯一可读的书。

在1984年的讲习班上,姜先生除了以此为教学教材之外,又口述成一份讲义,经助手整理而印发给



学员,并且在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取名为《敦煌学概论》。来自甘肃、新疆、吉林、辽宁、四川、湖北、湖南和浙江八个省的高等院校、有关研究机构的讲师和助理研究员们,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完成了原定的学习计划。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先生在评介姜先生的这部书时说:“在我国老一辈的敦煌学家中,姜亮夫先生不仅是第一位撰写普及敦煌文化与敦煌学知识读物的名家(这有1956年出版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为证),也是第一位在高校开办敦煌学讲习班的大师,这本《敦煌学概论》就是根据他在1983年的讲课录音整理而成的。《敦煌学概论》是我国第一本讲述敦煌学的简明教材。姜亮夫先生以自己走上研治敦煌学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入题,娓娓道来,饱含爱国主义的情感与对年轻一代的热切期望,推本溯源,深入浅出,从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评述敦煌学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价值,又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敦煌文献与艺术品的丰富内容,讲授了如何研究敦煌写卷的方法。一本不足八万字的小书,其内涵之丰富,学问之广博,感情之充沛,均非一般的高头讲章之所能及,也决不亚于一些煌煌巨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本小书是姜先生一生教学与研究敦煌学的结晶,也是他治学精神与人格魅力的集中体现。”

姜老生前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他对普及敦煌文化与敦煌学知识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反映了他的高瞻远瞩。因为没有普及,提高便失去了坚实的基础;没有普及,人才的培育就缺乏充沛的营养。姜老开设敦煌学的讲习班,撰写普及性的读物与教材,既开了我国高校培养敦煌学专门人才的先河,也是让更多的学人感受“世界学术新潮流”的有益尝试,这在敦煌学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④正是由于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等著名敦煌学家的亲自授课,使得这个讲习班的学术内容非常深厚,许多经过讲习班培训的学员后来都走上了学术道路,有的则走上了领导岗位。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当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教授,他领导国家教育部出资建立的这个敦煌学研究基地,每年都出版、发表不少论著,在国内、国外都有很大的影响。

四、中国敦煌学的四个时期

中国敦煌学的发生发展,我归结为四个时期:

- (一)中国敦煌学的创立期(1908—1931年);
- (二)中国敦煌学的发展期(1932—1966年);
- (三)中国敦煌学的停滞期(1967—1977年);
- (四)中国敦煌学的繁荣期(1978—2008年)。

下面分别对每个时期作些简要介绍。

- (一)中国敦煌学的创立期(1908—1931年)

中国敦煌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建立,要从真正发

表研究论著的1908年算起。但是,敦煌学的发轫则要从1900年6月22日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以后算起,虽然此前已有《敦煌杂抄》和《敦煌随笔》(皆常均著,1742年)、《敦煌县志》(苏履吉编,1830年)等书刊行。因为敦煌学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敦煌莫高窟文物尤其是藏经洞文献忽然出土而引发的。在国际上,最早引用莫高窟文物、文献出版的书籍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所编的《中亚的十种汉文碑铭》(1902年,巴黎),对《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唐李氏再修功德记》等重要史料作了译注并附录真迹。嗣后,苏州籍金石学家叶昌炽出版了《语石》(1909年)一书,收录了敦煌县城与莫高窟所存古碑拓本十余种。同年,王仁俊编了《敦煌石室真迹录》,罗振玉编了《敦煌石室遗书》(其中还包括《流沙访古记》、蒋斧的《沙州文录》、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记》),都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所提供的敦煌文献照片中整理刊布了一部分珍贵资料,使敦煌学的研究突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接着,一批重要的敦煌学著作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

从这期间出版、发表的敦煌学论著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一、中国学者与法、英等国学者都是最早的敦煌学研究者,共同奠定了敦煌学的基础;二、敦煌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国际性的,它的材料遍布全世界,研究者星罗棋布。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评“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三、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科学,涉及许多学术领域,谁也无法垄断所有的研究;四、这个时期以叙述考古发现和刊布、评介敦煌文物、文献为主,而以陈寅恪先生在1931年3月出版的陈垣《敦煌劫余录》的序言中提出“敦煌学”专名为敦煌学创立的标志。

(二)中国敦煌学的发展期(1932—1966年)

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其速度可谓“突飞猛进”、“一日千里”。老作者如叶昌炽有《缘督庐日记》(1933年),罗振玉有《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1939年)、《贞松老人遗稿》,都有很高的水平。新敦煌学家的大量涌现,特别是中国学者在许多方面赶超外国学者,是这时期的重要特点。例如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史岩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1947年)、姜亮夫的《瀛涯敦煌韵辑》(1955年)、谢稚柳的《敦煌艺术叙录》(1955年)、任二北的《敦煌曲校录》(1955年)、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7年)、王重民等六先生合编的《敦煌变文集》(1957年)、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1958年)、《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年)、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苏莹辉的《敦煌学概要》(1964年),等等,都是代表作。这时期的欧美、日本学者在敦煌

文献编目方面取得突破性成就。

(三) 中国敦煌学的停滞期(1967-1977 年)

在 1966 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之后,从事学术研究成了“反革命”的表现,统统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帽子,因此学术研究活动变得停滞不前了。如果说这时期还有什么敦煌学研究成果可以一提的,那就只有把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成果都算上,因为祖国大陆轰轰烈烈搞运动之时,彼岸的宝岛台湾一隅却仍然可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例如潘重规先生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1976 年)。不过,由于台湾地区的敦煌学家为数不多,所以还难以弥补大陆的总体上的缺失。

(四) 中国敦煌学的繁荣期(1978-2008 年)

季羨林先生曾在文章中指出:“建国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敦煌学研究的情况,没有多少改进。……一直到最近的十几年来,情况才有了改变。如果稍微夸张一点的话,应该说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有一批中青年的敦煌学者脱颖而出,他们业有专精,术有专务,融汇中西,通今博古。较之我们的先驱者,他们目光开阔,资料丰富,同并世的英、法、德、日、俄等国,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的同行们,关系紧密,互相往还,切磋琢磨,共同进步。……”^⑤这表明敦煌学进入了繁荣期。因为只有中国学者真正投入了敦煌学的深入研究,敦煌学才可能在规模上与深度上达到空前的水平。外国学者虽然有着良好的学术条件,但由于语言的隔阂,尤其是敦煌文献的写本识读属于高难度研究,中国学者大多都觉得困难,外国学者更不容易了。

如今的敦煌学,外国专家只有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美术、宗教等研究领域可能稍有优势,绝大部分研究领域已是中国学者的天下。例如潘重规主编的《敦煌俗字谱》(1978 年),敦煌研究院编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1980-1982 年),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1981-1986 年),季羨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 年),周祖谟的《唐五代韵书集成》(1983 年),苏莹辉的《瓜沙史事丛考》(1983 年),姜亮夫的《莫高窟年表》(1985 年),段文杰主编的《敦煌壁画》(1985 年)、《敦煌彩塑》(1989 年),饶宗颐的《敦煌书法丛刊》(1985 年),朱凤玉的《王梵志诗研究》(1986-1987 年),阎文儒的《中国石窟艺术总论》(1987 年),姜伯勤的《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1987 年),萧默的《敦煌建筑研究》(1989 年),郭在贻等的《敦煌变文集校议》(1989 年),项楚的《敦煌文学丛考》(1991 年),林聪明的《敦煌文书学》(1991 年),李正宇的《中国唐宋硬笔书法——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写卷》(1993 年),郑阿财的《敦煌文献与文学》(1993 年),张广达、荣新江的《于阗史丛考》(1993 年),常书鸿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1994 年),荣新江的《归义军史研究》(1996 年),张

涌泉的《敦煌俗字研究》(1996 年),黄征、张涌泉的《敦煌变文校注》(1997 年),季羨林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1998 年),等等,不胜枚举。

除了大批敦煌学研究著作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个时期的敦煌文物、文献图版资料的全面公布,也是值得特别称道。敦煌写本以往分藏世界各地,即使在中国境内的也分藏在几十家博物馆、图书馆和各种收藏机构中,通常情况下都如同收藏古董,秘不示人,敦煌学家们无法正常阅读这些资料,更不要说拍照、影印。

可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出面与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达成协议,共同刊布敦煌文献,事情得到了圆满的结果。如今,《英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 14 册,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1995);天津文物公司藏品《敦煌写经》1 册,已由文物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甘肃藏敦煌文献》6 册,已有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浙藏敦煌文献》已由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年出版;《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1 册已由中国书店 2007 年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50 册,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起陆续出版,估计年内可以出全。

其它地点收藏的敦煌文献,主要收编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这套总名为《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大型资料丛书,使流失海外长达一个世纪的藏经洞文献大部分通过出版的形式回归祖国。藏经洞文物总数大约近 6 万件(每一个编号为一件)。国内收藏近 2 万件,流失海外的大约为 4 万件左右。其中最主要的四大藏家,除中国外,还有英国、俄国、法国。上海古籍出版社从 1989 年开始同当时苏联列宁格勒的东方研究分所进行《俄藏敦煌文献》的谈判,开始了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筹备工作,并组建了专业编辑室。

经过 10 年努力,古籍出版社共派出赴俄、法工作小组 10 批,共 29 人次,目前已经出版《俄藏敦煌文献》17 册、《俄藏敦煌艺术品》5 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 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2 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7 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2 册、《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献》4 册、《俄藏黑水城文献》17 册、《英藏黑水城文献》4 册等,影印出版了流失在俄国、法国的敦煌资料绝大部分。《俄藏敦煌文献》的收藏总量,理论上为各藏家之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是海外收藏敦煌文献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俄藏敦煌文献》为举世罕见的秘籍,按每件文献的编号统计为 19000 余号,内涵极为丰富,其中有历代刻本《大藏经》未收的佚籍,有可与英藏敦煌藏品联缀合璧的著名变文,有《诗经》、《论语》、《史记》、《老子》、《庄子》等传统古籍,还有数百件官私文书。唐大历六年抄《王梵志诗》、出六臣注外的《文选》及唐抄本《玉篇》等,均极为珍贵。《上海博物馆



藏敦煌文献》所收的敦煌文献 80 号及附收唐宋写经 11 号,均为首次正式发表,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为法国伯希和的收藏品,出版包括全部汉文和非汉文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此外《吐鲁番出土文书》4 册,已由文物出版社 1992 年出版,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2 册,已由中华书局 2008 年出版。还有敦煌壁画、雕塑等艺术资料,文物出版社 1982 年出版了《敦煌莫高窟》5 册,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3 - 1998 年起陆续出版了《敦煌石窟艺术》22 册,其它出版社也有多种大型敦煌画册出版,此不一一介绍。

此外,还有《敦煌研究》、《敦煌学》、《敦煌学辑刊》、《敦煌学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唐研究》等期刊,多年来发表了大批有关论文,很好地推动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向前发展。

在这个时期,国外的敦煌学则主要有日本学者的

研究,超越了前期成就,如《讲座敦煌》(1980 - 1992 年)、《大乘佛教·敦煌卷》(1989 - 1992 年)等。欧美的敦煌学研究基本上与前期相当。

在这个敦煌学研究的繁荣时期,本人正好是个见证,或者说是一个直接参与者。我在 1985 年考入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之后,即随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专门从事敦煌学的研究,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一直以来乐此不疲,出版、发表了《敦煌变文集校议》(郭在贻、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校注》(黄征、张涌泉合著)、《敦煌愿文集》(黄征、吴伟)等合作著作和《敦煌语文丛说》、《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敦煌俗字典》等个人著作,还有数百篇论文。这些论著,与我的同行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成就,但是我确实感觉到了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对我国乃至世界敦煌学研究的重大作用和积极影响。

(责任编辑 楚小庆)

30 - year Great Changes of Dunhuang Study

HUANG Zhe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Dunhuang study has been closely connected with patriotism; it has become a criterion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hinese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depression of Dunhuang study in China means the general depression of Chinese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unhuang study means radical improvement of Chinese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It is absolute truth. Dunhuang study in China can be approximately divided into five periods: establishment period (1908 - 1931), development period (1932 - 1966), stagnation period (1967 - 1977) and prosperity period (1978 - 2008). The present author has been doing Dunhuang study ever since the 1970s and has witnessed rapid development in China, especially in Dunhuang study. During the 30 years, JI Xian - lin founded Chinese Dunhuang and Turpan Society, CHANG Shu - hong and DUAN Wen - jie founded Dunhuang Study Academy, and JIANG Liang - fu and JIANG Li - hong set up Dunhuang seminars. Chinese Dunhuang study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and attract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he author reviews and comments the 30 - year development of Dunhuang study in China, indicating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30 - year reform and opening upon Dunhuang study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a; Dunhuang study; development; 30 years; prosperity period; achievement

(上接第 16 页)

The Thre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Dunhuang Documents' Language

YUAN Bin, HE Xiao - wan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Dunhuang Documents have theirself Character, Dunhuang Documents' words also have Character. In this paper, we use a large number of fact - based language, System and in depth are discussed thre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Dunhuang Documents' words: Age characteristics,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y. Accurately grasp the whole of Dunhuang literature with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t properties of language, for improve in this area for future research in related subjects is a positive.

Key Words: Dunhuang studies; Dunhuang Documents' words; Age characteristics; Geographical features; Cultural identity.